

中国的崛起和非洲的结构转型：思想与机遇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林毅夫*

在这里,我将讨论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背后的结构性转变,以及它们对低收入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含义。

1. 中国的崛起

众所周知,经济理论的目的是帮助人们理解真实世界中观察到的现象,在此基础上,选择个人行为或者制定政策,以此来改善人们的生活。本着这种精神,我将讨论自 1979 年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并且解释为什么中国在 1979 年之前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快速增长;为何前苏联国家、东欧诸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并无中国在过去三十五年中的表现。藉由这样的认识,我希望为其他低收入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汲取一些经验教训,进而探讨陷入贫困数百年之久的国家或地区该如何改变命运,使之能同过去几十年的中国一样,实现类似的高速增长;同时,我也会探讨中国的崛起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1979 年的改革开放前,中国陷入贫困已有数百年历史。统计数据表明,1978 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 155 美元,不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这些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只有 490 美元。当时,中国 81% 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依靠农业为生;78% 的人口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即每人每天 1.25 美元。那时的中国是个内向型国家:出口仅占 GDP 的 4.7%,进口仅占 4.8%;两项加总,贸易占 GDP 的比例不到 10%。

这种情况在 1979 年后发生了急速转变。1979 年开始的转型使得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达到 9.8%,并且持续了三十五年之久。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的大型新兴国家中,中国是唯一一个没有经历金融危机的国家。经过三十多年快速、稳定的增长,2013 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 6 800 美元。现在,中国已经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数的 4 倍。在中国,6.8 亿人摆脱了贫困,这为全球减少贫困做出了巨大贡献。世界银行的宗旨是减少贫困。剔除中国的 6.8 亿脱贫人口,二战后世界贫困人口总数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就是成为第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原因。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或者“世界工厂”。在过去三十五年里,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年均增长率为 16.6%,贸易依存度从不到 10% 上升到现在的 50% 左右。这些变化为

* 作者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作者电子邮箱:justinlin@nsd.pku.edu.cn。本文系本刊编辑部根据作者在计量经济学会 2014 年中国年会(2014 China Meeting of Econometric Society)上的演讲录音翻译整理而成。由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研究生彭哲、毕舒博翻译,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助理教授廖谋华校译;作者做了最后修订。

何能在中国发生?为何过去没有发生?为何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没有类似的表现?这些问题的答案对制定发展政策含义深远。我鼓励所有的经济学家仔细研究这些问题,如果你们希望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的话。在这方面,我有许多经验和启示可以和大家分享。

中国经济为何能够实现年均 9.8% 的增长?这种增长出乎所有人意料——包括中国经济转型的总设计师邓小平。20 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的目标是所谓的“二十年翻两番”。也就是说,经济规模在二十年间增长四倍,对应的年均增长率为 7.2%。当时,没有人相信像中国这样的穷国,能够实现年均 7.2% 的增长,并且保持二十年之久。到今天,中国经济已经持续增长了三十五年之久,年均增长率为 9.8%。

要了解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就需要弄清楚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一些经济史学家指出,18 世纪之前,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率接近于零。他们发现,18 世纪以前,西欧国家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仅为 0.05%,这就意味着:当时高收入的西欧国家需要 1400 年才能使收入翻番。然而,从 18 世纪到 19 世纪中叶,经济增长的速度突然提高了 20 倍。在这一百五十年中,年均增长率是 1%,人均收入翻番只需要 70 年。从 19 世纪中叶到现在,西欧和北美的高收入国家,其年均增长率再次翻番,达到每年 2%。对于这些高收入国家来说,人均收入翻番的时间从 70 年下降到了 35 年。

究竟是什么带来了这些急剧变化?答案是因为工业革命,技术革新的速度加快了。不仅特定行业的技术创新速度加快了,而且,新的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业不断涌现。伴随着新产业的出现,经济结构发生转型:要素从低附加值的农业向高附加值的制造业转移,然后逐渐转移到了服务业。在 18 世纪开始的几十年中,这种技术创新和结构转型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这就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

任何国家,无论它是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想要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结构转型都是至关重要的。不过,在这方面,高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一些差异。对于高收入国家来说,其技术、产业都处于全球前沿。因此,对它们来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前提是发明。它们需要发明新的技术,需要发明新的产业。但发明的成本很高,并且有巨大的风险。数据表明,最近几十年,这些国家的年均增长率约为 3%。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维持经济发展,也要有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是,发展中国家与高收入国家在技术和产业方面都存在差距。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创新主要是模仿,也就是引进高收入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如果发展中国家知道如何利用这一“后发优势”的潜力,那么,创新的本体和风险就会比高收入国家低得多。它们就能达到数倍于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率。

经济数据表明,自二战以来,有十三个经济体发挥了这种潜力,实现了年均 7% 以上,持续了二十五年或更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从 1979 年开始的经济转型使中国跻身这十三个经济体之列。

因此,第一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中国通过利用后发优势,实现了年均 9.8% 的增速,并且保持了三十五年之久。可是另一个问题又产生了——后发优势已经存在了数百年,为什么 1979 年之前,中国无法从中受益?我的回答是,这和中国在 1979 年之前采取的发展战略有关。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用了三年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这时,中国有了实现现代化的动力。但是,当时的中国政府为中国经济发展设定的目标是: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也就是说,中国希望在 20 世纪五十年代就发展与英美国家同等水平的现代技术和产业。只是在当时,这类技术和产业要么受到专利保护,要么关系到国家安全。因此,英美国家绝对不会将这类技术、产业转让给中国。如果中国想要掌握这些技术、发展这些产业,中国就需要进行自

主研发。这样,中国就主动放弃了利用后发优势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希望发展的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而当时的中国是个贫穷的农业国。因此发展这类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的大规模产业,中国并无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上,进入这些行业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保护和补贴,正常经营,它们就无法生存。为了保护这些行业的发展,中国政府需要动用各种行政手段去调配资源,将资源直接分配给这类先进的、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并且通过保护、通过人为压低利率、汇率等,使投资这些行业变得有利可图。依靠这种发展战略,中国能够在 20 世纪六十年代进行核实验,在 20 世纪七十年代发射卫星。然而,造成的后果是:资源配置不当,政府的各种干预和扭曲抑制了激励机制,当然,经济效率低下。

也就是说,虽然在 1979 年之前后发优势一直存在,中国却并未从中受益。直到 1979 年,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情况才有了改变。通过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和合资企业,中国开始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正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中国也在这类行业上获得了竞争力。由此,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利润和资本,进而得以进行产业升级,从后发优势中获得了好处。我认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在转型之后举世瞩目,而在 1979 年转型之前却表现不佳。

当然,在二战后,中国并非唯一一个急切盼望拥有现代化大型工业体系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二战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采用了相同的策略,按照所谓的“斯大林模式”去发展重工业。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它们在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控制、实现政治上的独立后,开始推动现代化建设。按照当时流行的发展思路,即所谓的“结构主义”,这些国家希望通过发展大型现代化工业,从而迅速赶上高收入国家。这种理论看起来很有说服力:若要成为高收入国家,劳动生产率应与高收入国家相当;要使劳动生产率与高收入国家相当,需要和高收入国家相同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但在当时,低收入国家普遍贫穷,大多以农业生产为主,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自发地发展这类行业。因此,其中一些国家就开始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政府通过直接干预调动资源来发展重工业。结果却是,产生了和 1979 年之前的中国类似的种种扭曲,其经济表现也不尽人意。

二十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开始转型。20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初,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无论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还是非社会主义阵营,都经历了从政府主导型增长向市场主导型增长的转变。然而,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增长停滞、危机不断、经济崩溃;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一样。一些经济学家发现,在转型期间,以年均增长率来衡量,发展中国家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表现,要劣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表现。不仅经济增长率更低,发生危机的频率也比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高出许多。因此,一些经济学家将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称作发展中国家“失去的二十年”。

这些国家与中国一样,都是从政府主导的发展战略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道路。但是在转型过程中,为什么中国能够保持稳定和快速增长,而其他国家的表现却不佳?

我认为,主要原因是转型战略的不同。其他国家在转型之初,受到了“新自由主义”主流学术思想的影响。新自由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无论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还是非社会主义阵营,其经济表现不佳的原因是政府扭曲和政府干预过多。《华盛顿共识》概括了新自由主义的建议,即为了构建有效的市场制度,需要通过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稳定化来消除所有的扭曲,减少政府干预。可是,我们发现,一旦某个发展中国家采取这种策略,经济形势反而恶化了。主要原因是《华盛顿共识》没有认识到,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非社会主义国家,这些

保护和扭曲都是内生的,用于保护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如果没有这些保护,企业就无法生存。因此,在去掉各种保护措施后,许多企业立即破产,从而失业率剧增,带来社会和政治动荡。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经济就无从发展。许多国家担心出现这些后果,并且,因为这些资本密集型产业常常涉及国家安全和国防问题,并被视作现代化的基石,因此,即使在私有化以后,国家也不会对这些行业放任不管。实际上,在私有化之后,俄罗斯等国陆续恢复了对大型私人企业的各种变相保护和补贴。

变相的保护补贴要比显性的保护补贴效率更低。以前,我曾与中国和美国的同事有过多次争论,我强调,如果一个行业不符合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这个行业中的企业就不会有自生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就需要给予保护补贴,国有制有可能比私有制的效率更高,因为,私营企业主寻租的动力会比国企管理者更高。在20世纪九十年代,我的这些观点还只停留在理论探讨上;现在,大量的经验事实都支持我的观点。实际上,现在,俄罗斯国内很多寡头得到的保护补贴,比在国家所有制下得到的多得多。这也是其他转型经济体表现不佳的另一个原因,无论它们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还是非社会主义阵营。

为什么中国能够保持稳定并且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这是因为中国采取了更为务实的转型方式。中国的转型采取了所谓的“双轨制”:一方面,为了保持稳定,政府继续向重工业部门提供必要的转型期保护;另一方面,将过去受到压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各类企业开放。这样,中国就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实现经济高速增长。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在发展新的产业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要形成国际市场竞争能力,在生产出与其他国家同等质量的商品的同时,必须将总成本降到最低。而成本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生产要素的投入成本,这关系到一个行业是否具有比较优势。如果该行业在一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生产要素的投入成本就会很低。第二部分是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涉及到基础设施、商业环境、政府治理等因素。中国在经济转型初期,基础设施薄弱,商业环境落后,同时政府掌握的资源和执行的能力也有限,难以改善和提升整个国家的经营环境。因此,中国政府采取了建立工业园区或者设立经济特区(如厦门)的方式。虽然整体的经营环境较差,但工业园区和经济特区的基础设施、商业环境得到了改善。例如,政府可以通过一站式服务,以降低局部交易成本。根据世界银行的“跨境投资指标”,即使在今天,中国也属于全球投资环境最差的国家之一。此外,尽管中国经过了三十五年的市场化改革及行业改革,根据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指标,中国仍然排在第91位,在世界范围内居下游水平。但这是整体情况;就中国的工业园区和经济特区而言,我认为这些地区的投资环境和商业环境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

也就是说,中国政府采取了务实的方式,集中利用政府资源优先创造出局部良好环境,促进了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的增长。正因为如此,这类行业生机勃勃,其高速增长为整体经济的改革创造了条件。高速增长带来资本的快速积累,原来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一些行业也开始具备了比较优势,如资本密集型的汽车行业和装备制造业。现在,中国已经跻身中高收入国家之列,中国开始在这些行业具有比较优势。即使没有政府的保护,它们也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由此,政府能够去消除原有扭曲带来的遗留问题。

这就是中国的转型取得成功的原因。相比之下,采取其它转型道路的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增长停滞、危机不断、经济崩溃。

2. 非洲的结构转型

其他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国家,能否像中国一样实现高速增长?根据上面的分析,我的回答是:如果这些国家在制定发展政策时思路正确,那么答案绝对是“可以”。这些国家应当通过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来发展经济。这样,在这些行业,要素投入的生产成本将会最低。每个国家都会在一些行业拥有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应当识别出这些行业,并促进这些行业的发展。这样,它们具有世界上最低的生产要素投入成本,从而有可能不用补贴就具有国际竞争力;有了竞争力,它们就能积累资本进而实现产业升级。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它们可以利用后发优势,降低技术创新的成本和风险。

当然,要真正具备国际市场竞争能力,还需要降低交易成本。然而,这些国家基础设施落后,营商环境欠佳。按照目前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这些国家应进行华盛顿共识的改革,在全国范围改善营商环境,为各个地区改善基础设施。但是,各国政府都受到资源约束和执行能力的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国家也应该采取中国的做法。

解决基础设施、营商环境造成的瓶颈问题,建设工业园区或者经济特区是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园区内可以有不错的基础设施和可以接受的营商环境,有助于提升竞争力,从而实现中国那样的经济增长。

这是一种新的发展思路。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我试图试验这一思路。我当时强调:要想取得成功,需要识别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还需要创造适宜的环境,以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和私人企业进入这些行业,并帮助这些行业降低交易费用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形成竞争力。为此,在我的领导下,世界银行开展了一项研究,题目是“非洲的轻工制造业”。这项研究考察了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情况。很快,并且并不怎么费劲,我们锁定了制衣、制鞋等行业。这些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当地的工资水平仅为中国的十分之一。因此,这些行业在当地应该具有比较优势。事实上,这些行业在当地并无竞争力。因为交易成本太高,而且国际买家也不认为非洲国家能够生产出这些现代制造业产品并且保持一贯品质、按时交货。要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主动邀请中国投资者前来投资。目前,中国身居全球制造业宝座,也生产这类商品。但中国的工资水平正在迅速攀升,中国在这些行业上即将失去比较优势。如果非洲各国政府能够积极地招商引资、说服投资者前来,并为这些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局部投资环境,就能迅速取得成功。在这里,我很高兴地宣布:这一思路在非洲实现了。

2011年3月,带着上述研究和发现,我会见了埃塞俄比亚前总理梅莱斯·泽纳维。我指出,制鞋业是埃塞俄比亚的比较优势,而中国的制鞋业将会向别的低收入国家迁移。如果政府承诺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并且吸引一批企业迁移过来,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就会迅速腾飞。泽纳维总理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于2011年8月访问中国,积极邀请中国投资者赴埃投资。2011年10月,制造业的一些投资者访问了埃塞俄比亚并立刻被说服。华坚集团当即招聘了86名工人,随即将他们送往中国进行培训。3个月后,2012年1月,华坚的两条生产线、550名工人开始运营。三月份,华坚开始向美国市场出口。5个月后,华坚成为埃塞俄比亚最大的鞋业出口企业。到年底时,华坚的雇员数从550增加到了1800,而埃塞俄比亚皮革行业的出口也增加了一倍多。两年后,华坚的雇员数增加到了3500。在此之前,世界上没有人会相信,非洲国家——特别是像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内陆国家,其制造业产品能够出口到美国和

欧洲的高端市场。

华坚取得的成功具有星星之火的效果。受到华坚经验的鼓舞,埃塞俄比亚政府于 2013 年设立了一个工业区(指新建立的 Bole Lemi 工业区;华坚入驻的则是 2009 年落成的东方工业园——译者注)。第一期的目标是建成 22 间厂棚,其中 8 间已建成。一年之内,全部 22 间厂棚都被生产服装和鞋子的外国投资者抢租一空,尽管营商环境指标恶化了——2012 年,埃塞俄比亚的经营环境指标在全球排名第 125 位;2013 年,这一指标进一步恶化,降到了第 127 位。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在基础设施、营商环境、政府治理等方面,发展中国家确实面临着一些瓶颈;但是,如果发展中国家政府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目标,瞄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积极利用有限的资源,局部改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那么,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机会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内实现高速增长。我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机会在一、二代人之内,由低收入国家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收入国家。

提问环节

问题一

您提供了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功的一种解释。小时候,我的印象是——中国是个落后的穷国。这是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我惊讶地发现,这个国度与我从电视上看到的截然不同。中国已经迈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但在您的结论中,中国还不能算一个高收入国家。有些人认为中国会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我不能认同。在未来的二、三十年时间里,中国的增长轨迹会是怎样的?我想听听您的观点。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认为,如果中国继续秉承这种务实的态度,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维持市场的有效及国家的稳定,中国就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或许在下一个十年内成为高收入国家。根据我的分析,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来降低生产要素的投入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与此同时,通过不断完善硬件基础设施和软件基础设施(如制度)来降低交易成本。

当我们说,一个国家陷入“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则意味着该国没有实现动态的结构转型。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要从现在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人均年收入应达到 12,700 美元。为此,中国应该继续走我谈到的道路,只是要区分不同的产业。

中国在某些产业已经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如白色家电,包括微波炉、冰箱、洗衣机等,中国已经成为这些行业的全球领军者。在这些领域,中国应该发明新产品和新技术。这就需要 R&D(研发),R 指的是基础的科研,D 则是产品和技术的开发。D 是私营公司的职责,但 R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基础科研的支持。

对于中国居于全球领先地位的行业,政府应帮助这些行业进行研发。但是,中国的许多产业并不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因此,中国仍然可以从后发优势中获益。对于这些行业,需要有私营部门的企业作为先行者。先行者失败了,成本由自己负担;成功了,后来者会跟进。先行者不能享有垄断利润,先行者的成败都会给后来者提供有用的信息,因此,政府需要补偿先行者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进行创新的风险和外部性。当然,先行者的成败还取决于政府的协调和其他因素——要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一个行业需要有一个产业集群。这意味着,需要有很多企业同时进入这个行业。然而,如果没有政府的激励和产业政策,企业不会同时进入一个行

业,结果就会失败。这是其一。

其二,需要改善融资渠道以及其他基础设施等等,这些都不是先行企业自己能够完成的,政府的协调非常重要。政府应该务实,一方面提高市场效率,使得私营部门通过价格信号能够识别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另一方面,政府要补偿外部性;另一方面,积极主动的进行协调或提供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

我认为,中国迈入高收入国家的可能性非常大。实际上,我常说,中国还有维持二十年 8% 增长的潜力。因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 2008 年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 21%。这与 1951 年的日本、1967 年的新加坡、1975 年的中国台湾、1977 年的韩国类似——它们都属于前文提到的十三个经济体,并且都通过利用后发优势,保持 8% 至 9% 的经济长达二十年。从技术角度来说,人均收入仅为美国的 21% 这一事实说明中国还有在未来二十年继续保持 8% 左右经济增长的潜力。

当然,中国需要提高市场效率,并且解决双轨制转型的遗留问题。中国政府需要继续努力,为未来的发展铺平道路。我相信,上面所谈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下次,在不久的将来,当你回到中国后,你将发现,中国成了一个高收入国家。

问题二

林教授,您对中国颇为乐观的演讲令我深受鼓舞。但是,上面提到的是数字,而我关心的是质量。中国目前的环境问题非常突出。作为一名劳动经济学者,我更关心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文献中提到,有 35% 的农村孩子没有与父母同住,成为了留守儿童。这些孩子为经济发展的数字做出了牺牲。请问您对这些长期福利问题有何评论?

人们常说我很乐观,我觉得,我很客观,因为我会同时审视机遇和不足——需要改善的地方。我被认为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是因为其他人太过悲观。他们悲观,是因为他们总是拿高收入国家的经验作为参考,以及抽象的、总能达到最优配置的经济理论作为参考。这样,当他们研究中国的情况时,他们总能发现许多问题,于是就变得悲观了。

在过去的三十五里,中国行将崩溃的论调不绝于耳——中国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说明,上述理论和经验并不是很好的参考。我们应当回到亚当·斯密。这并不是说要回到《国富论》的观点,而是要回到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国富论》的完整标题——“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就是亚当·斯密研究方法的体现。

要使经济学界成为一种建设性力量,就要秉持客观,而不是套用高收入国家的制度、经验或理论作为参考。相反,我们应当研究现实,弄清楚现实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是什么导致了这些问题,以及解决问题所能调动的资源。只有采取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分享机遇、共担问题,从而提出能够解决问题、改善现状的政策建议。如果你只是提出了许多批评,而且政府真的采纳了你的建议,那么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结果比之前更糟糕。前苏联、东欧国家以及经历“失去的二十年”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例证。

例如,环境污染显然是个大问题,但问题的本质是: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每个国家都必须从低附加值的农业转向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再转向服务业。一般情况下,农业造成的污染并不严重,因为污染较为分散,而且农业耗费的能源并不多,排放也不多。但是,一旦进入制造业阶段,能源的使用密度和排放的密度都会增加,这时就会面临环境污染问题。当一个国家转向服务业后,能源的使用强度和污染排放强度就会大幅降低;到那时,这个国家也已成为高收入

国家 处理污染的资源也更多 这个国家将拥有更美好的环境。

这种情况不单单发生在中国。中国目前处于制造业阶段,未来几十年,中国也仍将处于制造业阶段。除非我们甘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想成为高收入国家;否则,我们要做好准备,这类问题在未来几十年中会一直存在。像英国这样的高收入工业化国家,因为污染,伦敦也一度成为了“雾都”。很多国家,如法国、美国以及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大都市地区,都曾存在类似的问题。甚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都有类似的问题。如何治理污染?迈向富裕的高收入国家,迈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这类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可以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现在,新技术比以往更容易获得,我们也鼓励企业采用新技术,并且实施了环境监管。我认为,情况会越来越好。谚语云:“鱼和熊掌不可得兼。”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应当明白:不能既得到鱼,又得到熊掌。

至于留守儿童的问题,短期来讲,应该推行城市和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得农村儿童和城市儿童享有相同的基础教育的机会和质量;从长期来讲,则应该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使儿童可以随父母迁徙到城市。